

中文摘要

對於「外來政權」的研究，首先遇到的難題是如何避免各自以褊狹角度詮釋的困境，為超脫此一困境，最適宜的作法是採取不同立場者都可以接受的觀點，這是本文採用政治權威途徑研究「外來政權」現象的主要原因。這一方面，漢娜·鄂蘭(Hannah Arendt)對於政治權威演進的描述，提供了有用的切入點，鄂蘭指出「政治權威」觀念起源自柏拉圖(Plato)，到古羅馬時期到達概念上的完全發展，但迄馬基維里(Niccolo Machiavelli)權威概念卻出現詮釋上的改變，這個過程給與「外來政權」研究一個有用的啟發。

柏拉圖洞穴論是古希臘權威觀念最充份的說明，他對 Idea 的置重，及如何將 Idea 引入洞穴過程的敘述，無異是對外來意識形態進入本土社群遭遇的狀況，及如何克服此一困境的描述，從柏拉圖的進路中，顯示 Idea 外來意識形態具有靜止性、回溯性與統一性，而要完成外來意識形態在本土社群生根的轉化，最重要的媒介是一個以哲君領導的政權，這個政權就是「外來政權」。為了鞏固政權，柏拉圖主張從教育著手，並利用政治神話強化階級統治，但柏拉圖晚年重新發現法律的整合功能，法律因此也成為外來意識型態統治的有用工具。

相對於外來政權參照對象的柏拉圖，馬基維里則是對於古典傳統與外來意識進行反叛，馬基維里代表的是「本土政權」的觀點，他要創建新的國家，開創新的歷史，也就是將國家視為最高價值的「國家理性」，他將建國與治國重責大任交給了新君主和創建者，但這兩種不同的角色卻可能引發矛盾與衝突。在建國階段，馬基維里雖然訴求除舊佈新式的恐怖統治，但在治國階段，他卻主張共和政體，由此也凸顯出政治的自主性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馬基維里對外來意識形態的利用，顯示與外來政權的鬥爭並非只有零和的結局。

柏拉圖與馬基維里的進路，提供台灣「外來政權」現象極有啟發性的反思，包括：一、無論是外來政權或是本土政權的歷史觀都是製造出來的；二、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互動可以產生正面效果；三、外來政權與本土政權都有英雄崇拜的心理；四、主體性的追求應以個體自主作為國家主體的前提；五、外來與本土的對立造成了一國之內的兩個國家。上述五點正是台灣「外來政權」現象的問題所在。歸結而言，無論外來或本土政權皆只關注「誰來統治」的問題，這一方面，霍布斯對「外來政權」角色的特殊界定與對個體價值的重視等見解，或許提供了可望解決此一困境的出路。